

郑珍“学人之诗”与 “诗人之诗”合一的理论主张

罗宏梅

内容提要 清代诗歌的特征是“学人之诗”与“诗人之诗”合一，然而迄今却未见有人系统梳理清代与之一致的诗学理论。作为宋诗派主将，在性情与学问的对峙上，郑珍虽亦循宋诗派性情自学问中出的合一理论；但作为清代诗风创作上的代表，他更注重在创作实践中探二者合一之径。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作诗先做人之论、养气说、“自打自唱”等主张，以旧论焕新意，突破了宋诗派片面注重学问的藩篱，从而为有清一代诗歌走向综合、创造自我时代的特色作出了贡献。

关于清诗的特征，陈衍曾在《石遗室诗话》云：程春海、祁春圃、何子贞、郑子尹等，“率以开元、天宝、元和、元祐诸大家为职志，不规规于王文简之标举神韵，沈文愬之主持温柔敦厚，盖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也”^①，并称郑子尹之《巢经巢诗钞》为其“弁冕”。刘世南先生在其《清诗流派史》指出，清诗的时代特色是：“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统一”^②。敏泽先生在给其所写的序中也说：清诗“远绍《诗》、《骚》，中继唐、宋诗的优良传统，超越元、明而有新的开拓与建树，而且具有鲜明的自己的时代特色：成为一代主要风标的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结合”。然而，十分奇特的是，如此之大的时代特色，迄今却未见有人专题系统梳理清代与之一致的诗学理论。郑珍虽不是诗学理论家，却是“合一”诗学理论的践行者，因而将其在创作实践中提出的诗学见解，放置在古代诗史和清代宋诗运动的背景中，可窥清代诗风和诗论表里关系的演进线索。

一

“学人”与“诗人”两因素与《诗》俱来。《诗》乃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源头，从体例上看，《诗》有风、雅、颂三类，风成于田野闾閻，是各诸侯国风土人情的体现；雅和颂则张文王、周公

之圣，大小雅之贤，涉政事、道德和学术。因此在诗歌的内容上就已基本划定了“学人之诗”与“诗人之诗”的领域。从表现手法上看，《诗》有赋、比、兴三法，在风中，多用比兴之法，在雅和颂中则主要采用赋的手法，比兴为情之所系，因而风主情；赋则宜举乎义理，因而雅和颂尚理，由是形成中国古代诗歌欲理还乱的、两大对峙的因素——情与理。从创作主体看，风源自民间，古有采风之说，出于田陌、里巷，雅和颂则是文人所作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汉以后采风之俗渐微，虽历朝历代民间始终激荡着强劲的诗情，虽明清之间有人搜集了一些民间歌谣，但鲜有列入诗史的。因此所谓中国古代诗歌史，实际上就是文人诗歌的创作史。由此看，《诗》所开创的风与雅两大诗学传统，涉及的主要是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与人格追求，是情与理之间矛盾复杂的纠结、冲突和融合。

人们常说魏晋的时代是文学自觉的时代，从文学自此时起挣脱儒家诗教的束缚，开始注重情的因素、注重形式规律、出现不少文论的文章专著看，此论确有道理。但从诗歌中至为重要的情与理的关系看，这并不是一个走向了综合的时代。如果说《诗》是中国古典诗歌情与理关系上混沌的肯定期，那么其后则是情与理争执的交锋期。《诗》后《骚》出，以屈原为代表文人所作的楚

辞,由于楚地风情和所写题材的缘由,显扬情之端倪。入汉儒家诗教的彰显将诗歌纳入“言志”的轨道。到魏晋,如果说建安文学开其时主情唯美之风,那么其后梁、齐时期文学则陷入了“绮縠纷披,宫徵靡曼,唇吻适会,情灵摇荡”^③,尚文为文的境地。情与理如此各执一端的争执交锋,为唐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。从诗理上看,情与理的有机谐和是唐诗达到高峰的重要原因。李白的飘洒俊逸中有人生哲理的感悟,杜甫的沉郁顿挫中含儒家忧时悯生的情怀,积极向上的边塞诗、山水诗、田园诗、亲情诗因时而出。

偏于理的宋诗是对唐诗的反拨,以及诗不得不另寻它径求发展的产物。情与理的对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。在一个诗人或一首诗中要做到不偏不颇、高度有机融合且非常难,何况一个时代林林总总数万之诗。情理之合永远是相对的。因而也有人把唐诗称为“风人之致”的“诗人之诗”。唐诗在情与理关系上总体上的合所达到的艺术高峰,曾有人说,唐以降无诗。对宋人而言,面对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均难以企及的唐诗,是一个无比严峻的挑战。合而必分,这是事物矛盾变化的基本法则。学习前人是发展的前提,在程朱理学背景中的宋代诗人,从唐诗中看到是杜甫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”的学卷气,看到的是韩愈好“奇”好“险”,标新立异、诡谲不凡的一面。许学夷在《诗源辨体》中说韩愈“以文为诗,实开宋人门户耳”^④。从“白体”、“西昆体”与“晚唐体”,经王禹偁、梅尧臣到欧阳修,到王安石、苏轼与黄庭坚,宋诗达到高峰。三大家各有侧重:“王介甫以工,苏子瞻以新,黄鲁直以奇。”(《后山诗话》)^⑤严羽说:“至东坡、山谷,始自出己意以为诗,唐人之风变矣。山谷用功尤为深刻,其后法席盛行,海内称为江西宗派。”^⑥严羽还指出,宋诗的基本特点是:“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,遂以文字为诗,以才学为诗,以议论为诗。”(《沧浪诗话》)

宋代较早讨论诗之情与理关系的是张轼,据南宋时盛如梓《庶斋老学丛谈》记载:“有以诗集呈南轩先生。先生曰:‘诗人之诗也,可惜不禁咀嚼’。或问其故,曰:‘非学者之诗,学者诗读著似质,却有无限滋味,涵泳愈久,愈觉深长。’”^⑦此段话的重要性在于,一是明确提出了“学者之

诗”与“诗人之诗”的概念,所谓学者,就是宋代的理学家;二是基本划清了二者的区别界限;三是赞学者之诗,表现了宋人论诗的倾向。到刘克庄则清楚明白地对二者下了定义:“以情性礼义为本,以鸟兽草木为料,风人之诗也;以书为本,以事为料,文人之诗也。”^⑧李复在评论韩愈诗歌时说:“子美长于诗,杂文似其诗;退之好为文,诗似其文。退之诗非诗人之诗,乃文人之诗也。”^⑨此段话一语道破宋人推崇韩愈,在于其诗是文人之诗。宋人以文字为诗,以议论为诗,以才学为诗,在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的关系上,自然是推崇学人之诗。刘辰翁说:“后村谓文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同,味其言外,似多有所不满,而不知其所乏,适在此也。吾尝谓诗至建安,五、七言始生,而长篇反复,终有所未达,则政以其不足于为文耳。文人兼诗,诗不兼文也。杜虽诗翁,散语可见。惟韩苏倾竭变化,如雷震河汉,可惊可快,必无复可憾者。盖以其文人之诗也。诗犹文也,尽如口语,岂不更胜彼一篇一曲,自擅诗人诗。”^⑩元人刘将孙则说:“长篇兼文体,或从中而起,或出意造作,不主故常,而收拾转换,奇怪百出。而作诗者每不主议论,以为文人之诗。不知各有所当,诸大家固有难言者。如昌黎、东坡,真以文为诗者,而小律、短绝、回文、近体,往往精绝。”^⑪

郑珍的诗学主张深受宋诗派倡导者、恩师程恩泽的影响。程氏是安徽歙县人,清嘉庆十六年辛未进士,改庶吉士,授编修,官至户部侍郎。“幼颖异,毁齿经传皆成诵,尤好读古书”,又“学识超时俗,六艺九流,皆深思而得其意,工篆法,熟精许氏”^⑫。程氏任贵州学政时取郑珍为拔贡,程氏调至湖南,郑珍曾受聘入幕。他告诫郑珍“为学不先识字,何以读三代秦汉之书?”^⑬循恩师教诲郑珍亦十分注重学问。在《招张子佩琚》(《前集》卷二)一诗他说:“世儒谈六经,孔子手删正。安知口所读,皆属康成定。念昔诸大师,鞠躬守残剩。微公集厥成,吾道何由径?众流汇北海,乃洗秦灰净。师法千年来,儒者各涵泳。未闻道学名,自见忠孝竟。程朱应运生,力能剖其孕。格致岂冥悟,祖周实郊郑。俗士不读书,取便谈性命,开卷不识字,何缘见孔孟?”^⑭他把不读书、不识字提到事关性命的高度,表明自己作诗与治学以学问为先态度。他曾对其子郑知同说:

“尊德性而不道问学，此元明以来程朱末流高谈性理，坐入空疏之弊；明于形下之器，而不明形上之道，此近世学者矜名考据，规规物事，陷溺滞重之弊；其失一也。程朱未始不精许郑之学，许郑亦未始不明程朱之理，奈何歧视为殊途，偏执之害，后学所当深戒。”^⑤郑珍在其著名的《留别程春海先生》中（《前集》卷一），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师从恩师的诗论观。首先他称赞恩师典型的学人之诗的风格，“我读先生古体诗，蟠虬咆熊生蛟螭。我读先生古文词，商敦夏卣周苜彝”。继而他指出其诗之源在博览经书并融会贯通，“其中涵纳非涔蹄，若涉大水无津涯。捣烂经子作醯醢，一串贯自轩与羲”。然后他列举充斥诗坛的“厚颜亦自居”盲目拟古的现象，“学语小儿强喔咻，雕章绘句何卑卑。鸡林盲贾为所欺”，进一步大力赞颂恩师在其时诗坛扭转一代诗风的巨大作用，“黄钟一振立起痿，伟哉夫子文章医。当今山斗非公谁”。郑珍崇古尊经，按照古代经义的原则立身行事，作诗自然也如此。在《息影山房诗钞序》中，他曾说和黎雪吉黎伯庸“每有所作，辄就正焉。或一字未安，必反复推求，至合于古而后已”，“于古今诗赋渊流，悉闯其落而涉其溪”，“祖于少陵，旁乃韩、白、苏、陆，沈浸含咀，神与古谐”^⑥。可见郑珍为学为诗的路径在宋诗派道上。

其实，不惟宋诗派宗宋，有清一代诗坛始终激荡着宗宋的潮流，原因有三：首先，社会环境使然，明清之际，时代风云激荡，激起文人强烈的使命感与现实感。许多批评家和诗人本身就是抗清活动的志士，他们对传统文化进行冷静、理性的反思，具有很强的诗史意识，主动以诗歌反映现实，以诗察史、以诗补史，如此必然与盛唐诗风疏离，必然注重学问，自然与尚理的宋诗相衔接。其次，统治者的引导和特定的文化环境使然，清朝统治者为了获取汉民族的认同感以实现长治久安，采取两种方式控制社会文化思想，一是编纂大型图书，如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的《全唐诗》900卷，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的《佩文韵府》444卷，初刊于雍正四年（1726）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1万卷等；二是钳制文人言论，据载仅康、雍、乾三朝见于记载的文字狱就达108起之多，在此种政治背景下，文人不得不转而埋首古籍，自然与注重学问的宋诗相贴近。再次，清代

的学风使然，乾嘉之际考据风靡，学人们热衷于音韵、训诂、校勘、辨伪、辑佚、以及史学上的补志、补表等工作。文人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改变，诗歌创作自然与注重学问的宋诗相吻合。由上看，以宗宋为标榜的宋诗派在诗学主张上自然应该是片面注重学问，然而这只是表象，也是人们通常对宋诗派认识的误区所在。到清代，“学人之诗”与“诗人之诗”趋于中和，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必然趋势。诗之发展贵在创新，新是诗歌的生命所在。否定是创新的前提，每一新诗派的产生无不是在继承前面诗派合理因素基础上，以补偏救弊的方式否定前者，并根据自己的时代需求，凸显自我的特色。自唐大综合后，宋诗明显偏于理的一端，明代的社会环境和诗自身的发展规律，致明诗断不致步宋诗的后尘。经元以后，汉族统治的恢复激起了明代文人对汉唐盛世的渴望。明代的七子派高高地扬起了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旗帜，宋诗则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。紧接而来的清代诗歌自然也不可能步明的后尘。

与明诗一味宗唐，忘记宋诗不同，清诗的另一突出特征就在宗宋的同时，也主张学唐，因此以祧唐祧宋概括之是十分准确的。其表现有二，一是在理论上主张诗不分唐宋。诗分唐宋，南宋严羽肇其端，“本朝人尚理而病于意兴，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”^⑦，“夫学诗者以识为主，入门须正，立志须高。以汉、魏、盛唐为师，不作开元、天宝以下人物”^⑧。清代的宗宋潮流虽以宗宋为主，但吸取了明代片面拟唐的弊端，宗宋而不排唐。清代前、中、后期均有一些宗唐的流派。即使是狭义的宋诗派，也并不全然反对学唐，反对的是神韵、格调两派的宗盛唐。其理由是“乱世”不能为“盛世”之音，宗开启宋风的杜、韩。叶燮在《百家唐诗序》中指出：中唐之“中”，“乃古今百代之中，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”^⑨。只需诗好、何分唐宋也就成了清人的见解。郑珍在《赠赵晓峰旭》一诗中，提出“性情异刚柔，声响遂宏喝”，“向来有私见，诗品无定派”（《前集》卷七），在《跋内弟黎鲁新〈慕耕草堂诗钞〉》中亦指出：“天资于宋人近，于唐人不近，即极力学唐，适成就一个好宋派，此关天资，不能强也。要只须诗好，何分唐宋。”^⑩终其一生，郑珍从来都没有说过宋优唐劣的话，在评价诗歌和

师法前人的问题上，他的态度一直是持“诗品无定派”和“转益多师是汝师”的意见。郑珍从不轻易贬斥其他诗派，反而能看到他们在各自领域中的特色。如他曾在《赠于伯英钟岳大令》一诗中称赞力主唐音的朱彝尊：“古来作者尽殊列，李何后数朱王高。”（《后集》卷五）

二是在创作上反对摹拟、力主独创。赵翼曾说：“大凡才人好名，必创前古所未有，而后可传世。”^②进而提出“诗文随世运，无日不趋新”^③的革新主张。郑珍在《留别程春海先生》中，讥讽盲目拟古的“学语小儿”“强啜呷”，“雕章绘句”，“其腹不果则力羸，其气不盛则声雌”。在《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》中说：“言必是我言，字是古人字。……李杜与王孟，才分各相似。羊质而虎皮，虽巧肖仍伪。”（《前集》卷七）宋诗派理论家何绍基强调独创，“绝去摹拟”。并提出一个标准：“不俗”。何绍基说：“顾其用力之要何在？曰：‘不俗’二字尽之矣。”何谓“不俗”？他说：“直起直落，独来独往，有感则通，见义则赴，是谓不俗。”他补充说：“前哲戒俗之言多矣，莫善于涪翁之言曰：‘临大节而不可夺，谓之不俗。’欲学为人，学为诗文，举不外斯旨。”^④陈衍指出：“诗最患浅俗。何谓浅？人人能道语是也。何谓俗？人人所喜语是也。”^⑤郑珍亦指出：“从来立言人，绝非随俗士。君看人品花，枝干必先异。又看蜂酿蜜，万蕊同一味。”（《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》，《前集》卷七）人不俗，自然不会去仿古。不去仿古自然就会像蜜蜂一样采万蕊之蜜，取唐宋诗之长，形成一家之特色。

二

“学人”与“诗人”犹如两座对峙的山峰，那么什么是沟通二者联系的桥梁呢？郑珍在其中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？

其一，在如何沟通学问与性情的关系上，郑珍提出了作诗先做人论及养气说。程恩泽在《金石题咏汇编序》论诗曰：“《诗》、《骚》之原，首性情，次学问。《诗》无学问，则《雅》、《颂》缺；《骚》无学问，则《大招》废。世有俊才洒洒，倾倒一时，一遇鸿章钜制，则惘然无所措，无它，学问浅也。学问浅，则性情焉得厚……况

训诂通转，幽奥诘屈，融会之者，恍神游于皇古之世，亲见其礼乐制度，则性情自庄雅……是性情又自学问中出也。”^⑥程氏此论要义有三：一是倡性情与学问相合，谓二者乃《诗》、《骚》之原；二是在性情与学问对立的关系上，将性情排在首位；三是在性情与学问统一的关系上，认为性情自学问出。即以学问作二者统一的桥梁。虽从实质看此论仍偏重于学问，但其倡合之立意显而易见。此可谓宋诗派典型的合一见解，包括郑珍的宋诗派诸人均有与此相同相似的论述。如郑珍在《跋自书杜诗》中说：“吾极不善书，然能知书之利病。大抵此事是心画，其本之正、气之大，风格之浑朴，神味之隽永……要书好根本总在读书做人。多读几卷书，做得几分人，即不学帖，亦必有暗合古人处，何况加以学力。”^⑦何绍基则进一步提出了“人与文一”的理论：“诗文不成家，不如其已也。然家之所以成，非可于诗文求之也，先学为人而已矣。……立诚不欺，虽世故周旋，何非笃行？至于刚柔阴阳，稟赋各殊，或狂或狷，就吾性情，充以古籍，阅历事物，真我自立，绝去模拟，大小偏正，不枉厥材，人可成矣。于是移其所以为人者，发见于语言文字，不能移之，斯至也。日去其与人共者，渐扩其己所独得者，又刊其词义之美而与吾之为人不相肖者，始则少移焉，继则半至焉，终则全赴焉，是则人与文一。人与文一，是为人成，是为诗文之家成。伊古以来，忠臣孝子，高人侠客，雅儒魁士，其人所诣，其文如见。人之无成，浮务文藻，镂脂剪楮，何益之有？”^⑧细微的差异在，何绍基固然也重学问，更多强调的是人之本性。

与何绍基相似，郑珍在《邵亭诗钞序》中 also 说：“余谓作者先非待诗以传，杜、韩诸公苟无诗，其高风峻节照耀百世自若也。而复有诗，有诗而莫复逾其美，非其人之为耶？故窃以为古人之诗非可学而能也，学其诗当自学其人始，诚似其人之所学所志，则性情、抱负、才识、气象、行事皆其人，所语言者独奚为而不似？即不似犹似也。”^⑨在《订淑浦舒氏六世诗稿序》中则说：“诗果足重乎哉？欲知其人，借以见其声貌而已”；“诗又在多乎哉？多而且美善者，一代盖不数人，此数人亦不出于一家。而与并时者，或有诗焉，或无诗焉，有诗愈得以想其人”^⑩。程恩泽是由学

问可观性情，由性情亦可观学问。郑珍则是由诗可观其人，学诗先学其人。表面看，郑珍与其恩师的见解并无二致，仿佛在强调程氏所说的“首性情，次学问”之理，细微之别在性情与学问统一的关系上，程氏是“性情自学问出”，郑珍强调的则是以学“其人”为先，而非以“学”为先。如此之论在《钞东野诗毕，书后二首》（其二，《前集》卷五），有“峭性无温容，酸情无欢踪，性情一华岳，吐出莲花峰”；在《书〈鄂生诗稿〉后》（《后集》卷四）有“文章气节一家事，岳岳耸我西南坤”；在《往摄古州训导，别柏容、邵亭三首》（《前集》卷七）有“黎大似同甫，莫五如伯恭。我病稍奸黠，青蒿依长松。然亦各缘性，无取和而同。要是老大时，定名当择从。即以文字论，外形诚自中……”等。

在作诗先做人的基础上，郑珍进一步提出“养气”说。在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所写、集中代表了他诗学观的《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》（《前集》卷七）中他说：“固宜多读书，尤贵养其气。气正斯有我，学贍乃相济。”在《诸生次昌黎喜侯喜至诗韵约课诗于余和之》（《前集》卷七）中，郑珍又一次强调了其养气的主张：“作诗诚余事，强外要中歉。膏沃无暗繁，根肥有新艳。”说明郑珍在此问题上的坚定态度。“固宜多读书，尤贵养其气”之论，强调养气之途径不全在读书，显然与其恩师的主张不相一致。“养气”之说始于孟轲。他的“养吾浩然之气”，重在主观道德修养。曹丕的“文气”说，承认人的天赋秉性各有不同。刘勰、苏辙和叶燮等的“养气”说，把先天的“才”一般地视作第一位的，但同时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。郑珍认为“养气”的方法“全在力行”，所谓力行，简单地说就是躬行实践。他说：“才不养不大，气不养不盛，养才全在博学，养气全在力行。学得一分，才长一分，行得一寸，即气添一寸。此事真不可解。故古人只顾学行，并不去管才气，而才气自不可及。所谓源泉混混也。如日光，如剑割云开。”^⑧郑珍的“力行”不仅于理学层面上有意义，在诗学上则体现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。如他在《追寄莫五北上》（《前集》卷三）一诗中说：“子今计偕趋春官，历练骏骨阅山川，河声岳色浩漫漫，吞纳胸中同郁盘。”主张通过游历来增长见识，开拓心胸，蓄养浩然

之气。又如在《送黎莼斋表弟之武昌序》一文中，他勉励表弟“出涪陵、鱼复，下三峡、秭归、夷陵，顺流趋荆州，经洞庭之口，及大别……过雪堂，观庐岳，北历徐、兖，瞻光日下，水陆不止万里，帆樯轮辙之间”与“屈、宋、李、杜、欧、苏之所发为文章，必有相遇于心日间者”^⑨。这一见解自然与程恩泽“性情又自学问中出”不甚相同。表象上看郑珍不过是在咀嚼前人的见解，因而常被人忽视，然而正是这些并不新鲜的观点在其时却意义幽远。

其二，在养气说的基础上，郑珍将学问与性情放置在创作的背景中，提出了“自打自唱”的主张。在性情和学问两端，宋诗派虽注重学问，但并不全然排斥性情。何绍基曾说：“吾之为诗，以达吾意而已！所欲言，而吾纵笔追之，即得焉，此天下之至快也。”^⑩又诗云：“诗人诗自性情出，有时自有无自无，温柔敦厚乃宗旨，矫揉涂泽皆非夫。世上读书千万人，若论善本皆圣徒。乃其发见不一致，有实秋结华春敷。”^⑪祁春圃也指出：“诗以言志，言为心声，若徒揣摩格律，雕琢辞藻，纵成结构，终乏性情。”^⑫曾国藩亦说：“凡作文、诗，有情极真挚，不得不一吐之时。然必须平时积理既富，不假思索，左右逢源。……若平日酝酿不深，则虽有真情欲吐，而理不足以达之，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，义理非一时可随意取办，则不得不求之于字句，至于雕饰字句，巧言取悦，作伪日拙，所谓修辞之诚者，荡然失其本旨矣。”^⑬然而这些性情之论，均未脱出程恩泽“首性情，次学问”，“性情又自学问中出也”见解的藩篱。

汪辟疆曾说，中国古典诗歌向来有如许缺憾，“于诗外别无专门学术也。若学术可称，而诗又为余事；且以学贍而累及于诗者”^⑭。郑珍填补了这一缺憾。他以治学为己任，穷尽诸子百家，素不以“诗人”自居，并多次称“我诚不能诗”、“作诗固余事”（《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》）、“作诗诚余事”（《诸生次昌黎〈喜侯喜至〉诗韵，约课诗于余，和之》）、“兹事诚小技”《吉堂老兄示所作〈鹿山诗草〉题赠》等等。但其作诗，并不以“学贍而累及于诗者”。郑珍从自己“言必是我言”的诗论出发，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“自打自唱”说：“集古之作，费心费手费目，无所不病，始成

一首。及得两句又工整又连贯，不胜其喜。他日读前辈之集，乃已被他先占，辄为之索然。故我平生绝不喜为此，还是自打自唱转有乐趣。弟以后亦莫用此心力也。”^③何谓“自打自唱”呢？那就是主张诗歌当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。郑珍在《〈邵亭诗钞〉题识》云：“邵亭与柏容平时论此事每推我，平心自揣，实才不逮两君，只粗服乱头，自任其性，似稍稍不无一得者。”^④《次韵答吕茗香》诗曰：“我吟率性真，不自谓能诗，赤手骑袒马，纵行去鞍羁。”所谓“粗服乱头，自任其性”，所谓“赤手骑袒马，纵行去鞍羁”，不是率尔操觚，一味直白叫嚣，而是冲破一切束缚，追求天马行空般的自由，毫不拘束表达真性情的宣言，与宋诗派在情感论述上扭捏隐晦曲折的表示相去甚远。把这同样并非独创的主张放置在宗宋拟古的思潮中，可说是那个时代追求创作自由最耀眼的光辉。莫友芝说：“当其兴到，顷刻千言，无所感触。或经时不作一字，又脱稿不自收拾，子弟钞存，十之三四而已。而其盘盘之气，熊熊之光，浏漓顿挫，不主故常，以视近世日程月课，植酿篇牍，自张风雅者，其贵贱何如也！”^⑤在《巢经巢遗稿序》唐炯也曾指出，郑珍的诗皆出于真人真事，故具有真情真感的特点：“凡所遭际，山川之险阻，跋涉之窘艰，友朋之聚散，室家之流离，与夫盗贼纵横，官吏割剥，人民涂炭，一见于诗，可骇可愕，可歌可泣，而波澜壮阔，旨趣深厚，不知为坡、谷，为少陵，而自成为子尹之诗，足贵也”^⑥。

其三，在创作的艺术方法上，郑珍亦有自己的主张。崇尚自由并非不要规矩，在《跋内弟黎鲁新〈慕耕草堂诗钞〉》，郑珍说道：“要装盖个什么款式，断要仿照古人规模，规模固百般巧变，终是离砖瓦、枋片、颜料、油漆一点不得，则多读多看书其要也”^⑦。在《柏容种菊盛开招饮》（《前集》卷二）一诗中他提出“评诗要到清净境，绮语不许污秋痕”的要求。此处的“清净境”，并非指佛家清净寂灭的“华严境界”，而是借佛喻理，指主、客观浑融一体的境界。但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境界呢？郑珍在《跋白书诗稿与王个峰》又别出心裁地以佛家修行涅槃之法为譬喻：“修炼家有三难：合鼎难，调鼎难，破鼎倍难。泥洹一路，若到此鼎不能破，必致郁塞以死。诗境正复

如此。”^⑧所谓“三鼎”，其实讲的是艺术构思的过程，如果说“合鼎”指素材汇集选题的过程，那么“调鼎”是艺术提炼，“破鼎”则是艺术灵感生发的过程。在诗境的层次问题上，在同一文中郑珍提出：“珍学诗二十年，自幸不郁塞以死。惟三寸婴儿，仅敢在十丈红尘上一游戏，再上而一二丈，则不敢去；正恐刚风一吹，虽不至毛骨俱化，然稍费气力把持，必不乐而苦矣。湘皋邓二丈，喜于十丈红尘外行走，有时尽力把持，几可到红云居处，及其力竭而堕，直离红尘不远。故宁乐守故吾，不敢妄行一步。二丈虽笑我孱，不惜也。”他用“红尘上”、“红尘外”与“红云居处”等比喻说法，把境界分为三个层次。认为只有艺术造诣精深，才力宏富的作者，才能攀越“红云居处”的境界。

作为那个时代中人，作为宋诗派的主将，郑珍不可能完全脱离时代的束缚，在“学人”与“诗人”，“学问”与“性情”的对峙中，郑珍自然是认同“性情”自“学问”中出的道理，并就此作了不少的论述，然而作为有清一代“学人之诗”与“诗人之诗”合一诗风的代表，他深谙二者合一的精义。他从创作实践出发，在其时拟古思潮中，有针对性地以旧论焕新意，在不分唐宋、反对模拟的问题上观点明确，在“性情”与“学问”的统一上，提出了引之深入的作诗先作人之论及养气说，更可贵的是，他将“学问”与“性情”这对复杂的矛盾放置在创作实践的背景中，突破了宋诗派片面注重学问的藩篱，突出地强调了情感在创作中的地位和作用，在诗学理论上虽无创新之处，但在创作实践上却为有清一代诗歌走向综合、创造自我时代的特色作出了贡献。

[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地域文化背景中的郑珍及其《巢经巢诗钞》研究”（批号：12XZW005）的阶段性成果]

①钱仲联编校：《陈衍诗论合集》上册，第879页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②刘世南：《清诗流派史》，第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。

③萧绎：《金楼子校笺》，许逸民校笺，第966页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

④许学夷：《诗源辨体》，第252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

- 年版。
- ⑤何文焕辑：《历代诗话》，第306页，中华书局2004年版。
- ⑥⑦⑧严羽：《沧浪诗话校释》，郭绍虞校释，第26—27页，第148页，第1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。
- ⑦盛如梓：《庶斋老学丛谈》中卷之上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《子部十·杂家类三》。
- ⑧刘克庄：《刘克庄集笺校》，辛更儒笺校，第4413页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。
- ⑨李复：《潘水集》卷五，《四库全书》本。
- ⑩刘辰翁：《赵仲仁诗序》，《须溪集》卷六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。
- ⑪刘将孙：《跋助集序》，《养吾斋集》卷十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。
- ⑫李元度：《国朝先正事略》卷四四，清同治刻本。
- ⑬《清史列传》第18册，第5647页，中华书局2005年版。
- ⑭郑珍：《巢经巢诗钞注释》，龙先绪注，第87页，三秦出版社2002年版。以下所引郑珍诗，皆出自此书。
-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郑珍：《巢经巢诗钞笺注》，白敦仁笺注，第1482页，第1506页，第1514页，巴蜀书社1996年版。
- 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郑珍：《郑珍集·文集》，第95页，第126页，第128页，第78—79页，第76页，第89页，第87页，第126页，第102页，第126页，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。
- ⑲王镇远、邬国平编选：《清代文论选》上册，第257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。
- ⑳赵翼：《瓯北诗话》，第38页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。
- ㉑赵翼：《赵翼全集》第6册，第938页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。
- ㉒㉓㉔何绍基：《何绍基诗文集》，第695—696页，第695页，第350页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。
- ㉕张寅彭：《民国诗话丛编》第1册，第318页，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。
- ㉖程恩泽：《程侍郎遗集》卷7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11册，第281页下栏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。
- ㉗何绍基：《祭诗辞》，《何绍基诗文集》，第60页，岳麓书社2008年版。
- ㉘祁寯藻：《诂经序集·自序》卷首，清咸丰六年原刻本。
- ㉙曾国藩：《曾国藩全集·日记卷》，第130页，岳麓书社2012年版。
- ㉚汪辟疆：《汪辟疆说近代诗》，第17—18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。
- ㉛黄万机：《郑珍评传》，第294页，巴蜀书社1989年版。

[作者单位：遵义师范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]

责任编辑：吴子林

